

中国汉英翻译教材:发展、编制及展望

王树槐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根据笔者的统计,建国后共有汉英翻译教材 395 部,其中单向普通型 136 部、双向普通型 147 部、领域实务型 112 部。在 40 余年的发展中,它们经历了萌芽探索期、发展成长期、繁荣丰富期。在教材编制上,理论基础有从对比语言学到翻译学的群理论八种,编写脉线有从“技巧中心型”到“多元素中心型”六种。文章最后从十个方面展望了汉英翻译教材编写的前景。

[关键词] 汉英翻译教材;发展;编制;展望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58(2023)05-0058-06

1. 引言

翻译教材是连接教师和学生的中间环节,它的内容选择、体例安排是决定翻译教学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笔者的调查,湖南大学立启凡编写的《汉英翻译技巧简论》(1979)是建国后第一部汉英翻译教材,在随后 40 余年的历程中,汉英翻译教材经历萌芽探索、渐步发展,直至繁荣丰富。根据

笔者统计,到现在汉英翻译(笔译)教材已有 395 部,可以分为三个类型:单向普通型(指单纯讲解语言转换,不涉及诸如科技、商贸等具体领域,且只讨论汉英单方向翻译的教材)136 部、双向普通型(指单纯讲解语言转换、双向互译的教材)147 部、领域实务型(指以“科技翻译”“医学翻译”等具体领域命名,和以“翻译实务”命名,包括了科技、商贸、新闻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教改项目“翻译专业《文学翻译》的‘结构主义+读后续译’课程模式探索”(编号:2021057)。

[收稿日期] 2022-11-23

[作者简介] 王树槐,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文学经典英译、翻译批评、翻译教学。

- [17] 宋国恺. 共享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及其意蕴——以群学为视角[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8(1):64-69.
- [18] 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9] 孙应祥. 严复年谱[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 [20] 汪毅夫.《天演论》:从赫胥黎、严复到鲁迅——《1902-1909:鲁迅与新思潮》之一节[A]. 福建省严复研究会. 93 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152-162.
- [21] 王宏斌. 戊戌维新时期“群学”[J]. 近代史研究, 1985(3):240-249.
- [22] 王民,王亚华.《天演论》与近代中国社会[J].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6(6):27-31.
- [23] 王秋安. 严复科学方法论与“天演论”的进化观[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4):35-37.
- [24] 王天根.《天演论》的早期稿本及其流传考析[J]. 史学研究,2002(3):68-73.
- [25] 魏义霞. 论梁启超与严复的相互评价[J]. 史学集刊, 2015(5):68-79.

- [26] 鄒国义. 吴汝纶与严译《天演论》[J]. 江淮论坛, 1992(3):77-83.
- [27] 吴汝纶. 答严又陵[A]. 吴汝纶尺牍[M]. 徐寿凯, 施培毅 校点. 合肥:黄山书社,1990:98-99.
- [28] 卢坡. 吴汝纶与《天演论》的出版[J]. 现代出版, 2016(4):64-65.
- [29] 谢天冰. 崇尚和传播现代理性思维的第一人——兼论严复编译《天演论》[A]. 福建省严复研究会. 93 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129-140.
- [30] 闫亮亮,朱健平. 吴汝纶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意识形态赞助[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2):76-82.
- [31] 王栻 编. 严复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2] 姚纯安. 清末群学辨证——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中心[J]. 历史研究,2003(5):15-24.
- [33] 俞政. 严复翻译《天演论》的经过[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108-112.
- [34] 张国荣. 从“天演”到“进化”——清末民初进化论观念的生成与传播[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4-17.

等多种文类翻译的教材)112部。那么,中国的汉英翻译教材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编写的理论基础和脉线选择怎样演变?教材编写的未来展望又是什么?便成为本研究的核心内容。

2. 汉英翻译教材的发展阶段

中国翻译教材的发展往往与中国社会的需求、教育界和翻译界的重大事件相关。我们根据翻译教育界的大事件,以及相应汉英翻译教材在数量、质量上的变化,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2.1 第一阶段:萌芽探索期(1979-1986)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对外交流日渐加强。教育界先识之士意识到翻译人才培养的急迫性,筚路蓝缕,开始了汉英翻译教材编写的探索。立启凡的《汉英翻译技巧简论》(1979)便是在此艰难的环境下诞生的,遗憾的是因为其材料多为革命战争题材而未能广传。

该时期汉英翻译教材共9部,其中单向普通型5部、双向普通型2部、领域实务型2部。其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教材多为“技巧中心型”,基本不涉及翻译理论。影响最大的是吕瑞昌、喻云根的《汉英翻译教程》(1983),它系统地讲授了汉英翻译中的技巧。第二,讨论的翻译单位多为词汇和句子,很少扩展到篇章。第三,教材所选译例政治性较强,很多选自《毛泽东选集》,或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

2.2 第二阶段:发展成长期(1987-2003)

1987年首届“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在青岛召开,这次会议普遍被学界认为是翻译学筹建的标志。受此激励,汉英翻译教材编写进入发展成长期。这一时期共有教材68部,其中单向普通型28部、双向普通型23部、领域实务型17部。其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编撰者开始有意识地将翻译理论融入教材编写之中,教材的理论选择也不断丰富。代表性教材有刘宓庆基于汉英对比的《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1991)、柯平基于符号学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1993)、陈宏薇基于社会符号学的《新实用汉译英教程》(1996)、金惠康基于跨文化交际的《汉英跨文化交际翻译》(1998)。第二,“问题为中心型”教材开始出现。这是编撰者不满足于单纯讨论翻译技巧,转而以具体的问题作为切入点编写教材的尝试。如冯志杰的《汉英科技翻译指要》(1998)讨论了科技翻译的文体特征、语法问题、修辞问题、逻辑问题。第三,“文类为中心型”教材开始出现。所谓“文类”,是指科技、商贸、法律、新闻、时政等不同的“文体类型”,大多数教材编撰者将其称为“文体”,我们

认为称之为“文类”更妥。这反映出编撰者注重教材的实践导向性与学生未来就业的致用性。如郝晓静的《实用汉英翻译指南》(2001)讨论的是经贸、科技、旅游、应用文等文类的翻译。第四,“多元素为中心型”教材开始出现,它容括了理论介绍、英汉语比较、翻译技巧、不同文类的翻译。如陆钰明的《汉英翻译指导》(1995),包括英汉语法差异、常见错误分析、翻译技巧、古文翻译、外贸翻译、广告与合同翻译等。

2.3 第三阶段:繁荣丰富期(2004-现在)

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正式获批翻译学学位点,并从2005年起开始招收翻译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标志着我国翻译学学科和学位点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也标志着翻译学科获得完整性和独立性(庄智象,2007:18-19)。2006年,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设立翻译本科专业学位。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自此,汉英翻译教材迅猛发展,进入繁荣丰富期。这一时期共有汉英翻译教材318部,其中单向普通型103部、双向普通型122部、领域实务型93部。其特征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多元素为中心型”教材迅猛发展。这类教材在第一阶段为0部,第二阶段增长到11部,第三阶段迅速增长到104部。第二,“问题中心型”教材发展较快。这类教材在第一阶段为0部,第二阶段为7部,第三阶段增长到49部。第三,“文类为中心型”教材发展较快。这类教材在第一阶段为0部,第二阶段为1部,第三阶段增长到30部。第四,“领域实务型”教材不仅数量增加,涉及的领域也不断扩展。相较于传统的科技和商贸,这一阶段教材关注的范围已扩展至医学(包括中医和西医)、文化、法律、新闻、公示语、服装、艺术,等等。第五,教材日趋系统化和专业化。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推出“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推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推出“应用型翻译系列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年推出“理解当代中国”系列翻译教材。这些教材构成一个完整而专业的系统,有效地服务了翻译人才的培养。第六,教材良莠不齐。虽然这一阶段教材数量井喷,但是其中既有选材匠心、组织合理的,也有译文粗糙、匆忙拼凑的。正如李德凤评论说:目前翻译教材重复太多,新意不足,……教材质量参差不齐,商业化倾向严重。(转引自陶友兰,2006:35)

3. 汉英翻译教材编写的规律性特征

在 4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汉英翻译教材的编写也表现出一些规律性特征,主要体现在理论基础和编写脉线上。

3.1 教材编写的理论基础流变

关于翻译教材的理论基础,陶友兰(2013)曾从国际视野出发,高屋建瓴地介绍了教材编写的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教育心理学、可读性理论、市场营销理论等五种理论,它是自上而下的指导性研究。张美芳(2001)基于 1949—1998 年之间教材的考察,分为“词法、句法流派”“功能流派”和“当代译论流派”三个理论类型。我们的调查则是自下而上:基于教材分析,梳理 40 余年理论基础的历时发展。

早先的汉英翻译教材编写是没有理论支持的,编撰者完全依据自己的经验。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编撰者有意识地运用翻译理论来指导教材编写,因而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和效能性。下面我们依次介绍:

1) 对比语言学

刘宓庆的《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1991)是最早运用对比语言学,基于汉英语法差异、表现法差异来编写的汉英翻译教材。之后的《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2006)进一步深入,从词汇、语法、思维与表现法等 14 个方面进行细致比较,并丰富了翻译方法。王建国的《汉英翻译学》(2019: 78, 118)提出“汉语重过程、英语重结果”“汉语界限性弱、英语界限性强”的区别,并相应展示压缩和扩展的策略。这两位学者的教材都是研究性教材。

2) 符号学与社会符号学

符号学研究的是符号、客体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柯平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1993)基于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符号学编写,陈宏薇的《高级汉英翻译》(2009)基于皮尔士(Charles Peirce)的符号学编写。他们都重视指称、言内、语用三类意义的转换。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由奈达提出,除了三类意义外,它还重视交际效果,主张功能对等。陈宏薇的《新实用汉译英教程》(1996)基于此理论,以“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思路展开汉英翻译教学。

3) 文化翻译学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翻译理论界受到西方“文化转向”的影响,教材编撰者随之将文化翻译作为编写对象。他们基于文化理论(包括跨文化交际),探讨文化翻译的原则、策略、方法。这一类教材关注的是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通过不同层面的汉英文化比较,学习汉语文化的表达策略与方法。代表性教材有金惠康的《汉英跨文化交际翻译》(1998)、马会娟的《汉英文化比较与翻译》(2014)等。

4) 语篇类型理论

贾文波最早根据纽马克(Peter Newmark)区分的语言三种主要功能,即表情(expressive)功能、信息(informative)功能、祈使(vocative)功能,编写了《应用翻译功能论》(2004)。他在阐述三种类型英汉语篇差异的基础上,主张“功能性归化”“行业性归化”。基于此理论编写的还有李长栓、施晓菁的《理解与表达:汉英翻译案例讲评》(2012)等。

5) 功能—目的论

德国的功能—目的论是对忠实的反拨,主张译文要实现翻译任务的目的,而不是对原文的等值。方梦之、毛忠明最早采用此理论编写《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2005)。他们在详细介绍功能—目的论后,比较它与等值论的不同,讨论应用翻译中的删减与改写策略,以及全译、节译、改译、译要、综译等具体方法。基于此理论编写的还有陈小慰的《新编实用翻译教程》(2006)等。

6) 篇章语言学

篇章语言学关注语篇的语法衔接、语义连贯、篇章结构、语境综观、语篇意图等问题。以此为基础编写的代表性教材有李运兴的《汉英翻译教程》(2006)和《汉英语篇翻译》(2015)等。他强调语篇的整体性与层级性、不同文体在翻译方法上的差异性、英语平行语篇与汉英翻译的互文性,推出 3R 教学模式(Read—Remember—Re-contextualize),即阅读目标语相关语篇—记忆词语、句式、搭配—灵活运用。

7) 比较翻译学

魏志成的《汉英比较翻译教程》(2006)是基于比较翻译学编写的。杨自俭(2006: 3)在其教材序言中将比较翻译学总结为:建立在比较翻译基础之上,系统地揭示与重译、复译的理论及实践相关的翻译规律的学科。该教材在比较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内,以独立语篇的多种译文为示范,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译文参与评价。

8) 翻译学的群理论

傅敬民、吕鸿雁的《当代高级英汉互译》(2004)从翻译理论的核心——翻译标准、直译意译出发,逐级讨论支撑翻译学的语义、语法、语篇、文体、思维、文化、审美、叛逆七个理论群,限于篇幅我们只介绍“审美与翻译”。在这一部分中,两位编撰者首先介绍了从玄奘到刘宓庆的审美翻译思想,然后从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审美客体部分讨论了形式美和翻译(包括语音、词义、句式)、内容美和翻译(包括所指意义和实用意义)、意境美和翻译;审美主体部分讨论了译者的文化素养、审美意

识、审美经验。针对每一个论点,他们设计了说服力强的译例。另外,每一章的练习与理论紧密相联,是对理论的复习、巩固;“实例评析”中用到了比较翻译学的思路,有效地诠释了翻译的主张。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以上理论兴衰的原因。

1)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理论,一方面过于宽泛难以切实落到翻译实际,另一方面它视翻译为“解码-编码”活动,忽略其他一些重要问题,现已为编撰者放弃。2)文化理论既可以像“泛文化”一样漫无边际,又可以只局限于特定文化因素的讨论。一方面,文化翻译是翻译教学永远绕不开的课题,因此目前有多达21部文化翻译的教材;另一方面,“文化翻译学”在我国“学人对此专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多为引用、阐释或介绍”(方梦之,2023:81),因此多数教材只是讨论表层文化因素的翻译,鲜有在文化互动的规律、影响译者文化立场和策略的因素等方面作出深入思考。3)语篇类型理论虽然能区分英汉三种语篇在体裁结构、语言特征方面的差异,但因为框架过于宏大,不好与实践中的文类一一对接,因此也逐渐淡出视野。4)功能-目的论虽然在20年前中国的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但现在已不是理论的主流,因此近年少有编撰者将之作为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不断发展的“应用翻译学”^①已见雏形,它可能会在将来的中国学界取代功能-目的论。5)比较翻译学创始于2000年,然而它在知网的关键词和主题词只是5和2,可见“学界乏人”(方梦之,2023:80-81)。此类教材的优点在于,能从比较之中发现优劣、佐证主题,但其材料大多局限于文学翻译,且有的原文可能有一个优秀的译文,但难以找到平行的比较材料,因而会给教材编写带来困难。6)篇章语言学一方面强调宏观的语境思维,能将复句、单句、词汇收纳其中,并在后续类似材料中复现,另一方面注重词汇的衔接、意义的连贯,重视相关英语语篇与待译语篇的互文性,因而一直为编撰者所重视。7)英汉语对比理论因为从深层次区分了英汉语言在思维、选词、构句、谋篇上的差异,能授予学生“渔”的手段,直至今日还为编撰者采用。8)翻译学及支撑学科的群理论,秉持“整体主义”的教育思想,从语义、语篇、文体、思维、文化、审美等多维角度引导学生了解翻译过程、形成翻译技能,是培养学生复合翻译能力的重要理论基础。

3.2 教材编写的脉线类型

教材编写的脉线是指编撰者组织全书的主要线索,是贯穿全书的“经络”。一部教材可以没有理论基础,但一定会有一个脉线。脉线与理论基础不同:理论基础是深层次的指导思想,常常只是出现在教

材开始的介绍部分;而编写脉线则是表层的、捆系全书的丝线。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考察侧面。比如何平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1993),理论基础是符号学,但是编写脉线却是“随性型”,包括翻译的语义学、翻译过程(理解和表达)、错误分析三个部分,中间并无严密的逻辑关系,也没有完整的教学体系。根据教材分析,我们将教材脉线分为六类:技巧中心型、对比中心型、文类中心型、问题中心型、多元素中心型、随性型。

1)技巧中心型

技巧中心型教材主要讨论翻译中的增/减词法、定语/状语从句的翻译等等技巧。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有一定意义的。从第一部教材,立启凡的《汉英翻译技巧简论》(1979),到2023年彭萍的《译无巨细:英汉互译技巧示例》,都是以技巧为脉线编写的,可见它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2)对比中心型

对比中心型教材是从英汉语言的比较着手,通过透视语言的差异来讲述语际转换的方法。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类教材全书都是对比,只要对比的内容达到了70%,我们就认定它是以对比为中心的教材。如杨元刚的《英汉语对比与翻译教程》(2021),在主张描写与解释结合、同一性与差异性结合的基础上,从概论、文化与思维、词汇、语义、句法、修辞、篇章七个层面深入对比汉英语言,进而衍生出相应的翻译方法。

3)文类中心型

文类中心型教材在简要介绍翻译理论之后,立即转入科技、旅游、新闻等多种文类的翻译方法与技巧,且文类翻译的内容要占70%以上。如方梦之、毛忠明的《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2005),在简要介绍翻译总论、实用文体与翻译、功能目的论与应用翻译之后,迅速转入具体文类的翻译方法,包括科技翻译、经贸翻译、法律翻译、新闻翻译、广告翻译、旅游翻译、政论翻译。

4)问题中心型

问题中心型教材一改过去技巧为中心的思路,围绕翻译中的具体问题编写。如肖海燕的《服饰文化汉英翻译教程》(2022),编写体系包括传统服装、传统服饰品、丝绸、刺绣、新时代服饰五个板块的汉英翻译;每个板块下面又有诸多分项问题,如在传统服装下面又包括深衣、胡服、龙袍、唐装、裙装、官服、戎装、旗袍、中山装九个子项的翻译。

5)多元素中心型

多元素中心型教材将翻译理论、英汉对比、翻译技巧、典型文类及其他个人感兴趣的问题都纳入教

材编写中,每个部分平均着墨。与对比中心型、文类中心型教材的对比或文类要占 70% 不同,这类教材每一个部分所用篇幅均等,约为 20% 左右。如陈宏薇的《新编汉英翻译教程》(2010) 包括汉英翻译的基本理论(翻译标准、翻译单位、译者修养)、基本知识(文化、思维、语言的对比)、词义翻译、句子翻译、句群翻译、篇章翻译(包括不同的文类)。

6) 随性型

随性型教材多为编撰者的随性思考或漫性笔谈,是他们在翻译实践中的经验或体会。这类教材没有明确的脉线,不按照一定的学术体系和严密的逻辑结构安排,要么写得非常有特色和创见,让读者收获甚丰,要么写得非常散漫肤浅,让读者收获甚寡。好的教材如何刚强的《译写融合,助撰佳章——汉译英理念与实践新讲》(2022),提出新境界下汉英翻译学习的译写理念,并以九个话题展开,阐述如何将翻译与写作结合,讲好中国故事。在随性型教材中,译文粗糙、粘贴拼凑的也不在少数。

表 1 六种脉线教材在三个阶段的数量分布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各类型总数
技巧中心型	7	26	78	111
对比中心型	0	3	23	26
文类中心型	0	1	30	31
问题中心型	0	7	49	56
多元素中心型	0	11	104	115
随性型	2	20	34	56

从上表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实:1) 多元素中心型教材的数量最多,在当下(第三阶段)已成为教材编写的大流。这类教材的繁盛表明,越来越多的编撰者希望能够将理论、对比、技巧、文类等问题都纳入其体系之中,让学生获得比较全面的知识与技巧。2) 技巧中心型教材数量非常庞大,仅次于多元素中心型教材。在这类教材中,除了大量以“技巧”命名的教材外,一些领域型教材,如科技翻译、医学翻译等教材,常常以技巧作为脉线编写,反映出编撰者希望在短时间内尽快让学生提高翻译技巧、形成技能的愿望。3) 问题中心型教材逐步成为编撰者喜欢的类型,他们希望从实际问题的角度切入,从多维视角将待译对象阐述清楚。4) 多数对比中心教材都是基于一些陈旧且“绝对化”的比较,如“形合与意合”“动态与静态”等。要想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理论突破,非常困难,此类教材也处于低位状态。5) 文类中心型教材因为涉及众多的实务领域,编撰者要熟谙每一种实务,非常困难,因而此类教材也处于低位状态。6) 随性型教材可以摆脱套路的教材编写体系,编撰者可根据自己从业多年的经验,就某些

有深刻体会的问题自由写作。因为它的灵活性、跳跃性,也为一些编撰者喜欢,然而它难以成为教材编写的主流脉线。

4. 翻译教材编写的前景展望

下面我们从十个方面展望未来教材编写的前景。

1) 不管是单向还是双向翻译教材,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一方的优势往往是另一方的劣势。单向教材的优势在于,能够针对汉译英与英译汉在思维路径上的不同,集中精力深入探讨汉译英过程中语法、词汇、句子、篇章的教学。另外,鉴于当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社会需求,在选材上也要注重挑选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相关的“中国故事”内容,展开“中国英语”独特表达的教学。

2) 双向教材的优势在于提高教学效率:一方面通过英汉语对比让学生明白汉译英和英译汉相反的思维路径和操作策略;另一方面,英汉翻译的原文也要为汉英翻译的译文提供互文借鉴。(这恰恰是大部分双向互译教材存在的问题;或者只讲共性,不讲差异性;或者只是盲目罗列材料,没有利用好英译汉对汉译英的启示。)

3) 在教材编写理论方面,能有直接指导作用的是对比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应用翻译学、翻译美学,编撰者可以根据自己意欲强调学生某一(些)侧面的能力而酌情选择。在教材编写脉线上,六种脉线都有自身的长处,它们与教材的范围和内容,以及编撰者自身的经验和水平相适合,比如领域实务型教材以问题为中心编写,往往会有更好的效果。

4) 翻译教材对句子层次翻译能力的培养,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写出规范,进而有张力的句子。规范是指语法正确(如没有垂悬结构、平行内容在语法上对称)、没有语义冗赘(如不必要的范畴词、不必要的副词[形容词]修饰动词[名词])、用词清晰而不抽象虚泛、符合“简明英语原则”(Cutts, 2020);张力是指通过使用隐喻、转移修辞、矛盾修辞、无灵主语句、行使动词功能的介词等手段,使得句子简洁、耐读、有韵味。我们需要向汉学家,如霍克思、葛浩文、闵福德、蓝诗玲等学习,将他们翻译的中国文学经典中精彩的句子做成双语语料库,供学生阅读、记诵、仿用。

5) 翻译教材对篇章层次翻译能力的培养,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篇章的权衡与顺应能力,即根据翻译的任务和读者的需求,对原文内容作出价值判断:哪些需要翻译、哪些不需要翻译、哪些需要补充信息、哪些需要重写(如将汉语诗幻性的、虚的表述,转变

成英语事实性的、实的表述)。留下来的内容还要做好各部分之间的衔接、连贯。因此需要精选范例(这对编撰者提出了真实翻译经验的要求),让学生学会“取舍”与“译写”,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6)教材编写要有正确的“理念”统摄。所谓“理念”,是指教材编写中核心的思想或总体的意识,它可以用一个短语或一个句子凝练出来。理念既可以统摄全书,也可以统摄书中某一板块。以全书为例,方梦之教材的“变通”理念、何刚强教材的“译写”理念、陈宏薇教材的“思维转换”理念、杨晓荣教材的“篇章观照译意”理念、傅敬民教材的“整体汇通”理念、范武邱教材的“美学”理念、王建国教材的“过程-结果”理念,等等,让各自的教材既富有特色,又让学生受益。以局部板块为例,单句翻译的“简洁+张力”理念、流水长句翻译的“主题拆解+逻辑重组”理念、篇章翻译的“体裁样式+目的顺应”理念,均能抓住汉英翻译中各个层级的核心问题。

7)教材编写要体现“以学生为中心”,它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激发学生兴趣。教材需要从经典性和时下性的材料中找到代表性问题,让学生“生惑”,然后是“诱惑”“解惑”,让学生觉得趣味盎然。第二是发展学生的认知与思维。比如讲解汉语流水句翻译时,先要教会学生分析原文内涵的多重主题,通常一个汉语主题用一个完整的英语句子表达,这一步是对原文的切分;然后将每个主题拆解为多个命题小句,分析命题小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并列、连动、转折、递进、总说-分说;再后是讲解每一种逻辑关系在英语中的多种表现手法(可以制成语料库)。第三是开发与教材相关的教材外阅读和翻译练习,它们要与每章的主题相关,以便学生巩固翻译技巧并形成自动化。第四是注重全人培养。教材所选的内容,既要有科学性的材料,又要有人文性的材料;既要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又要影响学生为人处世、安身立世的态度。

8)教材编写要融入多学科知识,如教育心理学、文体学、叙事学、隐喻学、应用翻译学等,使之既符合学生的认知过程,又多维度拓宽他们的视野。如就教育心理学而言,在教材编写时,可以借用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理论(Bruner, 1999),将词义、简单句、复合句、语篇的核心问题抽出来作为“学科结构”(ibid:3),然后运用螺旋式课程往复上升,低一级结构的内容会在高一级结构中复现,其难度会更大,学生的理解和掌握会更加深刻,进而提高教学效

率。再如就叙事学而言,今天的叙事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展,包括文学叙事、历史叙事、医学叙事、科技叙事等,这些理论可以借鉴于领域型教材的编写。

9)教材走向要多模态化、立体化。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高度发展,为翻译教学、翻译教材编写带来机遇和挑战。纸质版教材出版后,需要开发出与之配套的电子教参、网络拓展课程、关联语料库等,方便学生自主学习。同时,同类教材的立体化资源可以整合,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以最大程度发挥育人功能。

10)建立翻译教材评价的市场和学术机制。评价具有调节、激励、导引、惩戒的功能。一方面,可以在翻译教学指导委员会下面成立教材分委员会,聘请资深学者对新版教材进行匿名评价;另一方面,出版社也可以联合不同学校的教师、学生对新版教材进行评价。这些评价的分数等级、评论情况都可以放在网站上,供潜在的购买者参考。最后,委员会可每两年评选一次优秀翻译教材,被认定的优秀教材视为与专著同等的学术成就,进而鼓励优秀教师潜心编写高水平教材,特别是研究性教材。

注释:

①在这一领域,方梦之(2019)的《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代表了国内最高研究水平。可以预测,以应用翻译学为理论基础的教材会在不久的将来蓄势而出。

参考文献:

- [1] Bruner, J.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 Cutts, M. *Oxford Guide to Plain English* (5th e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3] 方梦之. 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9.
- [4] 方梦之. 跨学科创学之成败得失——66种跨学科的翻译学鸟瞰[J]. 外国语,2023(2):79-87.
- [5] 陶友兰. 翻译目的论观照下的英汉汉英翻译教材建设[J]. 外语界,2006(5):33-40.
- [6] 陶友兰. 我国翻译专业教材建设:理论建构与对策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 [7] 杨自俭. 关于翻译教学的几个问题——《汉英比较翻译教程》序言[A]. 魏志成. 汉英比较翻译教程[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11.
- [8] 张美芳. 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9] 庄智象. 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Remembrance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 Theory

[**Abstract**] The author reviews his experience of attending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 Theory in 1987, describes the background,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ference in documentary style, and expounds its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theory;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 Theory; the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Textbooks in China: Development & Prospect

[**Abstract**] There are 395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textbooks published in China from 1979 on, comprised of 136 uni-direction ordinary ones, 147 bi-direction ordinary ones, and 112 area-based ones. Historicall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textbook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germination, growth and booming. Eight theories from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to translation theory are chosen to compile textbooks, and six types of “binding thread” from “skill” to “multi-factors” are used. Finally ten solutions are suggested to improve textbook making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textbook; development; prospect

On Deng Zhenglai's Translation in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As a translator and researcher, Deng Zhenglai's academic translation covers a variety of social sciences, such as jurisprudence, anthropology, constitutionalism, economics, politics and sociology, etc. His research-based translation thought and standard of following the academic theoretical context have developed a school of his own in the academic translation field. Deng Zhenglai's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s centered on the jurisprudence translation has set a typical example for academic translation. The research into his academic translation thought and practice provides much revelation not only to the jurisprudence but also to other social science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Key words**] Deng Zhenglai; jurisprudence translation; research-based translation; theoretical context; multi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To Construct the National Power of Discourse: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ast Seven Decades

[**Abstract**] It has been seven decades ever since the laun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periodical carrying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literature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adership in 1951. This outbound translation activity,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translating practice, bore the responsibility to convey the national will, image and ide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as marked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Cold W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but to construct its own national power of discourse by means of the national translating activity. This national endeavor has opened up new arenas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Chinese insights and solutions. Moreover, for those nations which would aspire to maintain their own national and ethnic identit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this experience also shed lights on how to construct their own power of discourse, how to engage in equal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how to enhance world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seven decades; national power of discourse